

王占元督鄂与驱王运动

孔祥征

1914年至1921年,北洋军阀王占元统治湖北达七年之久。王督鄂期间,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贪婪地敲剥民财,穷兵黩武,祸鄂殃民,其罪行不亚于张敬尧之祸湘、莫荣新之祸粤。王占元在湖北的残暴统治,激起湖北人民的极大愤慨,1921年前后,湖北掀起了轰动全国的驱王运动。1921年8月,王被迫离鄂,逃离天津,驱王运动获得胜利。本文试就这段历史作一概述。

投靠北洋军阀,称霸中原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生于1861年2月,行伍出身。青年时代投淮军当兵,后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甲午战争后投袁世凯,由袁氏新建陆军的工程营队官逐步升为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统领。辛亥十月,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的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随冯国璋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王部同其他清军从起义军手中夺取汉口。11月末,又取汉阳。

王占元因镇压革命、屠杀人民有功,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提升为第二镇统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将清政府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驻保定。1913年移驻信阳,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和白朗起义。1914年4月,袁世凯任命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1915年,王以武力强迫人民投票,拥袁称帝,被袁贼封为壮威将军。同年底,蔡锷讨袁,王向袁表示效忠,袁又封他为襄威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6月,袁死后,王又转投黎元洪,被任命为湖北督军兼民政长,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湖北最忠实的代理人。1920年6月,黎元洪被逐后,徐世昌任命王为两湖巡阅使。

护法战争时期,西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摆脱北京政府的统治。统治这些地区的官吏既不愿受北洋军阀的统治,也不愿与广东军政府合作,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北京政府为了统治全国,乃采取以西南制西南的政策。为推行这一政策,北京政府因“鞭长莫及”而苦恼,而湖北又地处中原,毗邻西南,王便成为执行这一政策的关键人物。王极力煽动川湘滇黔几省脱离广东政府,劝其北归。因此,对湘之赵恒惕、川之刘湘、滇之唐继尧、黔之刘显世等极尽拉拢之能事。而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军阀也正需与北洋军阀苟且偷安,便与王达成联防条约,相许互不侵犯。1921年4月初,王又串通桂、滇、川、黔、湘、赣等省军阀,组织“六省联防”,以对抗广东政府,反对孙中山借道西南各省北伐^①。王占元与西南各省的“善邻”关系,便成为他的一笔政治资本。

王本是直系军阀,但他惯于看风驶舵。直皖战争后,奉系张作霖的势力逐渐伸向关内,王为保住他在湖北的地盘,进一步控制长江各省,便与张作霖相勾结。张作霖为了将他的势力伸展到长江下游,也想拉拢王占元对抗直系。1920年10月,王占元派策士杨文恺去东北,与张签订了同盟密约:张承认王为长江四省之领袖地位,但苏皖两省归张负责,对于政局,双方取同一主张,非经张使许诺,王督不得持异议;在军事上互相“援助”等等^②。这一密约

实际是王占元叛直附奉的记录。

当时，北京政府面临着重重困难，尤其是财政经费及所谓“和平统一”等问题，又因直奉意见分歧不得解决，内阁总理靳云鹏乃于1921年4月25日，在天津召开“四巨头”会议，除邀曹锟、张作霖赴会外，多次电邀王占元出席会议。在会上，王占元吹嘘他联络西南各省的“成效”，提出所谓“南北统一”计划，叫喊“以收抚川湘、援黔、援桂，驱逐广东之非法总统，以奠南北共和之局”^③。会上诱王以疏通西南各省军阀，使其北归，完成“统一”的重任。会议还决定由曹、张、王三使领衔发出遣责孙中山“选举总统，破坏统一”的电报^④。这次会议除了一致反对广东军政府外，其它问题一个也未解决。

天津会议后，王占元踌躇满志，随带大批扈从，声势煊赫地回到了武昌。

镇压革命，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王占元为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湖北人民实行血腥的统治。

王占元督鄂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查革命党人。1916年，袁世凯称帝，复辟帝制，湖北革命党人起而反对。2月，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反袁称帝，王占元以铁血手段扑灭了这次起义^⑤。1917年10月，有革命党人秘密来到武汉，与湖北革命党人联络。王占元获悉后，立即给警务厅下达命令，严禁革命党人的活动，极力破坏革命机关。1917年11月19日，王占元又颁布布告，严厉取缔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重赏“乱党机关密报而因查获者”^⑥，致使一些秘密联络点被破坏、被查封。王对革命党人切齿痛恨，提出“宁可冤杀多人，不可滥纵一人”^⑦。凡是抓获的革命党人，抄其家产，施以酷刑。在关押革命党人的监狱中“设有炮烙、凌迟、剥皮等刑。”^⑧王占元曾指示他的爪牙在蒲圻嘉鱼等县，拿获革命党人，用铁链子穿锁子骨，游行街市，甚至将犯人的头掘孔，灌注煤油，用火焚烧^⑨。其残忍性，令人发指。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武汉学生继起响应，在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革命知识分子领导下，5月18日，三千多学生齐集武昌阅马场，进行露天演说，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卖国贼”、“争回青岛”、“誓雪国耻”等口号，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湖北全省。王占元视学生的革命行动如“洪水猛兽”，严令各学校校长禁止学生外出，通令军警捉拿露天演说学生。6月1日，武汉学生分赴三镇演讲，王派出军警沿街巡逻监视，并向演讲学生行刺开枪，非法拘捕。当日捕去学生数十人，被驱打受重伤者十余人。其中李鸿儒、吴序宾等人因伤势过重，先后死亡，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⑩。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福州事件。消息传来，湖北各界人民极为愤怒。12月5日，武汉工商学界分别召开会议，商讨声援福州人民，一致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并在汉口福建会馆成立国民大会筹备处，决定17日召开国民大会^⑪。王占元闻讯后，即命汉口镇守使杜鸿宾、警察厅长周际云派军警包围福建会馆，取缔国民大会筹备处^⑫。王的专制统治，激起全国人民公愤。在全国人民声援下，16日，武汉各界十万余人，在汉口歆生路爱国花园提前一天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提出撤换驻闽日领，惩办行凶日人，收回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八项条件。大会通电全国，“务望全国一致协争，以重国权而伸民意”^⑬。王占元异常恐慌，于18日至21日，接连发出布告、通令、训令八道，一再申令禁开国民大会，禁抵日货，禁止学生在校外集会，停止演讲宣传，并扬言如有违抗者，即以“扰乱治安”论处，甚至以“格杀勿论”相威胁。

王占元屈日媚外，镇压爱国同胞，深得日人嘉奖。日本政府以“联络友邦”为由，授予王占元一等“勋章”一枚，特派驻汉领事等人专程送汉^⑭。在全国人民反对日人夺我青岛、誓雪

国耻的怒潮声中，王于1919年5月15日在军署大官厅张灯结采，举行受勋仪式。王身着“大礼服，先至礼堂候迎，俟往接专员捧勋到礼堂即向(东)行三鞠躬礼，再向勋位行一鞠躬礼，礼毕作乐悬佩”^⑨，演出了一场卖国求荣的丑剧。

王占元在帝国主义面前是奴才，对人民是独裁。在王的统治下，湖北人民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一切革命的思想、进步言论，都视为“异端邪说”。进步书刊一律被禁止。1920年2月，湖北教育界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来武汉讲学，陈在武昌文华大学、武昌高师发表《社会改良方法》、《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说，主张打破私有制，“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对湖北人民产生巨大影响。王占元闻之大怒，“急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⑩。

3月，从法国回来一批华工，其中一部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便在武汉工人中传播列宁领导俄国工人士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北京政府十分恐慌，急忙训令王占元“恐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令严密防范。”^⑪王占元秉其旨意，以“有碍治安”为由，禁止工人集会结社。如有工人罢工，则按治安警察条例定罪。

王占元对湖北的专制统治不仅在城市，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为防范人民反抗，将全省分为鄂西、鄂北、鄂东、鄂南四大防区。把鄂西北视为所谓有“匪”区，派重兵驻防，人民稍有反抗，即行镇压。1921年春，鄂西一带农民因不堪军阀蹂躏，乘南军退出鄂西而北军未及驻防之隙，揭竿而起。起义军“头裹红巾”、“施行符咒”、“自称神兵”，在首领张兴汉率领下，迅速占领施鹤四乡，声威大震。王占元急派施鹤警备司令孙传芳率兵进剿，并拨款二万元作“清剿”军费。孙调张俊峰旅到西乡屯堡，被起义军击败。随后，孙又调宣恩驻军协助张旅合围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起义军死伤七八百人，首领张兴汉被俘^⑫。与此同时，王占元又派王都庆旅“清剿”了利川、咸丰一带农民起义队伍^⑬，残酷地镇压了鄂西农民起义。

巧取豪夺，贪婪地搜括湖北人民财富

王占元在政治上是一个狡诈残忍的封建军阀，在经济上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虫。他通过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聚集了七八千万元的财产，比直系首领冯国璋的家产还要多。王占元搜刮民财的手法有以下几种：

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湖北官钱局本为北洋政府控制的“金库”，地方无权干预，而王占元督鄂后便将它变为私产，随意挪动，成为王氏搜括民财的重要来源。1920年5月，湘军发动驱张(敬尧)战争，北军退出长沙、岳州，武汉震动，“王占元假借军费为名，向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提款一千万元，预备卷逃，不给收据。嗣后高氏暴死，世多款之。”^⑭据《官钱局所造清册》记载，自1916年1月4日至1921年8月15日止，王任督军期内，历年所挪用官钱局之款总计约有二三千万元。此外，还挪用造币厂之款三百余万元^⑮。

发行公债，私铸钱币。这是王占元以公肥私的又一主要来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地方割据，各地军阀可以滥发公债，私铸钱币。1921年1月，王占元以筹集军饷为名，发行地方公债二百万元^⑯。4月，又以防务吃紧，向财政部索取元年公债三百万元，特种券五十万元^⑰。王占元还派江汉道伊张覆青赴京，要增发官票二百万张。七年来，鄂省官票加印至一亿张^⑱。而湖北官钱局所印官票因纸质劣，财政部令重印，废票解京焚毁，王占元及其爪牙乘机舞弊^⑲。更有甚者，王占元及其爪牙竟威逼造币厂工人加开夜班，私铸钱币(而所铸之币减轻铜元和银元份量)，致使湖北官票不知有若干万万，而王氏所发出的伪币，亦不知有若干万万，真币伪币，充斥市面，无人敢辨。

拍卖公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胜皖败。王占元为了讨好直系军阀曹琨、吴

佩孚，在汉口逮捕了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皖系)，并以遣散其部属为名，派财政厅长魏联芳和官矿署总办金鼎筹资，向美商辉华洋行借美金二百万元，以湖北大冶象鼻山矿作抵押，因群起反对，遂改以武昌造币厂作抵押，而造币厂之主权全由美人控制^⑧，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谋取私利。

勒价收买公产，经营私业。王占元利用职权勒价收买湖北公产，汉口义昌洋行由王占元所经营，由财政厅长魏联芳充当经纪人^⑨。并在汉口外国洋行及天津、青岛等地投资经营大批产业。

以暴力手段，向商人掠夺、勒索钱粮。王占元经常以战争恐怖威吓武汉商人，以维持“治安”为由，向商人索款。1920年10月，命财政厅向汉口新记银号借大洋四十万元^⑩。11月，王为扩军备战，又向汉口银行团借款二百万元^⑪。1921年1月，王以年关将近，军饷告急为由，在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特邀武昌、汉口两商会会长列席，王逼其募现款一百万元^⑫。1月29日，王占元又“特召樵运局局长王嵩儒来省磋商，与淮盐公商接洽，拟向鄂岸两淮盐商筹措五十万元，以济眉急”，使盐商迭连叫苦^⑬。3月，王又向楚兴公司经理徐荣廷借款二十万元。王在短短几个月内，竟向商人勒索达数百万元巨款，极大地扼杀了武汉民族工业的发展。

截留税款，加征田赋。京汉铁路地跨河北、河南、湖北三省，南北交通要道，每年上缴大批路款，成为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自直皖开战后，王占元即以湖北防务吃紧为名，扣留京汉路自武胜关以南各站路款，每月提款五万元^⑭。从1921年4月起，每月又加收五万元。同年4月，王占元又召汉口电政盐督处长王省三进署，令将电报营业收入项挪拨现银十万元，并派付官渡江领解^⑮。他还催征各县赋税，1920年8月1日，颁发催征赋税办法，限定至10月底止，将十年度田赋征齐，加重农民负担，残酷地剥削农民。

吞蚀军饷。鄂省驻有主客军约有十至十二万，每月军费约七十余万(有的说一百万)元，皆由省财政厅筹措。王占元即以筹集军饷为名，向湖北人民攫取大量钱财。但所取之款，只有少数用于军饷，绝大部分为王氏化为私有。1921年7、8两月军饷，全为王占元所吞没^⑯。省垣二师系王氏发迹之所，王欠该师军饷不少。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对其他部队就更不必说了。两年来，王占元吞蚀军饷达千万元^⑰，致使军队“枵腹从戎”，逼成兵变。

除此之外，王占元还扣教育经费、贩运铜元，运销卢盐，购卖烟土等，获取暴利。日人笹川洁氏曾说：“我还在汉口的时期，据说某督军(指王占元——笔者注)在职八年中，每年平均刮一千万，共计刮出八千万的资产，即以这八千万兑换土地。在那时候，即我在汉口的时候，他已在山东成为亘达四县的土地所有主了。”^⑱王占元将搜括来的这笔巨款，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在山东投资于纱厂、煤矿；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电力股份公司；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趁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他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⑲。王占元督鄂期间，极其贪婪地吮吸着湖北人民的血汗，成为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暴发户。

纵兵哗变，烧杀抢掠

王占元吞蚀军饷，酿成了士兵中的不满情绪，加剧了军队内部的冲突，促成了省内各地兵变。据记载，自1920年至1921年6月，先后有天门、钟祥、鄂城、黄州、广济、阳新、蒲圻、罗田、英山、崇阳、沙市、宜昌、武昌、沙洋等地二十余处兵变。变兵所到之处，奸抢烧杀，无所不为。其中尤以宜昌、武昌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

1921年6月4日夜10时，驻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孙传芳旧部)，在宜昌东门哗变，结队出营，放枪放火，南门队伍亦继起响应。变兵将官厅、银行、货栈、邮局及海关公会等抢掠一空，无数机关、法团、商店、民宅付之一炬，房屋焚毁千余家，损失计千万元以上，市民被击毙者数百人，伤者千余名。其惨状为历来兵变所未有^⑤。王占元本是兵变的祸根，为了安抚民心，他派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及二十一旅旅长王都庆督队弹压，变兵始各溃散。

宜昌兵变未止，武昌兵变又起。7月7日晨，宜昌变军二十一混成旅孙建屏团，由宜昌乘快利轮船到省，停泊鲇鱼套。旋即奉王占元命令，起驻南湖。变兵刚一登岸，即放枪行抢。王占元拟派他的心腹第二师进行弹压，不料早已蓄谋哗变的二师亦效尤起来。是日夜十一时半，由左旗第八团首先发难，鸣枪数排，随用洋油纵火为号，右旗七团、南湖二师司令部内的军队和保安门外的军队，都先后鸣枪举火策应。省城内外军队，均一致行动。顿时，武昌城内城外，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弹雨横飞，全城鼎沸。变兵到电话局，迫令割断电话总线，到电灯公司，放枪数排，将机械灯打坏，顿时，全城一片漆黑，然后进行抢掠。

变兵初入省议会，枪伤警卫数人，拥入议员室内，分别搜索会计室内贮钱铁柜，一时不易打开，遂蜂拥抬走。变兵为了泄愤，又猛攻督军署。因攻军署不得手，遂直趋长街，放肆横掠，在后宰门街、花堤街、王府口、司门口、斗级营、察院坡、汉阳门一带，挨家搜掠，继用煤油分途纵火，计官钱局造币厂，及长街一带精华商店，皆是焚掠兼施。商民死数百人，伤不计其数。大火从七日深夜，直烧到9日清晨才熄灭。武昌这次空前的浩劫，共计达三千万元以上。

王占元为维持岌岌可危的军事统治，于兵变次日，在督军署内召开军事会议，秘密决定处置变兵办法。先传谕变兵，由王占元训话。王诱骗变兵曰：“你们如想归家，须将枪械缴下，另给饷票十元，抢来物品，亦听你们自由携去，并不追究”。变兵本想脱去军籍，解甲归家，今见有这样便宜事，无不欣然缴械。下午，二千多名变兵，肩挑背驮，兴高采烈地乘船过江，至江岸刘家庙上车北返。变兵上车之后，王占元急电驻孝感鄂军第四旅旅长刘佐龙：“务于该变军过境时，以军队拦阻，概予枪毙，不准漏网一人。”刘佐龙接电后，遂布置军队于各要隘。傍晚，装运变兵车开到，刘下令停驶，以两车头堵其前后，以机枪向变军射击，弹如雨下，死者枕籍。王占元还污指孝感村民为变兵，任意枪杀。计被击死者七、八百人^⑥，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惨剧。

驱王运动轰动全国，王占元逃匿天津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暴统治和掠夺，激起湖北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1921年前后掀起了轰动全国的驱王运动。

这一运动是从民选省长开始的。1920年至1921年，各省涌现出废除督军和民选省长的“自治”运动。在湖北，也提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1920年8月，何佩谔因安福系嫌疑被免除省长职，王占元力保荆南道尹孙振家升任。孙乃山东人氏，王占元的亲家，是一个无恶不作贪婪分子，任省长不到一个月，搜括湖北民财达一百万元，引起湖北各界人士的愤怒。8月10日，旅京鄂人在湖广会馆集会，公推孔庚、秦国镛等六人，前往总统府、国务院请愿，要求政府收回成命，革除孙振家职务^⑦。9月18日，北京政府改派北京京官湖北籍政客夏寿康回鄂继任省长。其实这种“鄂人治鄂”的主张，只不过是地方官僚与北洋军阀政府在权力分配上的一种斗争，是统治阶级换汤不换药的一种手段，根本解决不了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鄂人欢迎夏氏到任的大会上，施洋代表湖北人民向夏氏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实行

“平民自治”，“自制省宪”、“废除督军”等项要求，并警告夏氏说：“我们原不想你做善事，只要你莫做恶事；我们原不想你利民，只要你不害民”^④。由于王占元的反对，不久，夏寿康也被逐下台。武昌兵变开始后，驱王运动达到高潮，湖北各界联合会先后七次拍发讨王通电，宣布兵变惨状及王占元之罪恶，阐述湖北人民驱王自治主张，并派出人员分处联络，共谋驱王办法。旅沪、旅京津、旅湘等地鄂人，积极响应。

3月6日，旅京湖北同乡会，举孔庚等十人为代表，赴总统府、国务院请愿，要求撤换王占元^⑤。7日，旅京津湖北同乡会又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驱王办法。4月，旅京湖北同乡会与湖北各界联合会推举蒋作宾、李书城、孔庚和施洋等赴长沙，请求赵恒惕出兵援鄂。6月12日，武昌兵变后，旅京湖北同乡会派代表十二人，赴国务院请愿，向总理靳云鹏提出裁兵，废督，惩办王占元^⑥。21日，湖北旅京、津同乡会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救亡大会，到会者九百三十七人，会场陈列“王占元十七大罪状”，首由旅京同乡会代表李继膺报告前次大会议决各项议案之进行情形，次由武汉灾民代表袁正道、宜昌灾民代表袁保初报告两地兵变之惨状，缕缕泣陈，满座闻之无不酸鼻，大会作出了讨王的七条决议。会后，全体赴新华门请愿，他们高举白色旗帜，旗帜上写有“王占元罪该万死”、“湖北精华尽成灰烬”的口号，并向政府提出惩办王占元的三项要求。

蒋作宾、李书城、孔庚、施洋等赴湘后，便在长沙设立驱王总监部，蒋作宾任总监，孔庚主持一切事宜。他们还创办《湘鄂通讯社》^⑦，专门揭发王占元祸鄂的罪行和刊登驱王文章，以唤起社会同情和声援。6月14日，旅湘湖北同乡会在长沙会馆召开驱王大会，会议决定组织驱王委员会，主持驱王事宜。

旅湘鄂人因感势单力薄，还采取“联赵驱王”策略。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也有自己的盘算，在他看来，以武力占领湖北，把湖北卷入联省自治范围，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可以巩固湖南地盘，同时也可以使湘军向外发展，缓和湖南军人内争。于是决定联络四川军阀刘湘，组织援鄂军。7月20日，湘军组织“援鄂自治军”，推赵为总司令。22日，湖北省自治军将士、兵民及各团体代表一万五千余人在长沙召开大会，议决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推举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院长，夏斗寅（当时任湘军团长，鄂籍）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⑧。随即湘鄂联军发表出师文告，宣称湘军出兵之宗旨在于“驱王”离鄂。

7月26日，赵恒惕令夏斗寅先行出发，27日，又令叶开鑫、鲁涤平、宋鹤庚等湘军攻鄂，29日，四川军阀刘湘以“援鄂军”总司令名义，出师湖北。

对于湘鄂联军的北进，王占元亦有布置。22日，王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十八师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分路迎击湘鄂联军。

王占元因兵变之后，部队已无战斗力。湘鄂联军长驱北上，迅速攻占蒲圻、嘉鱼、通城、崇阳，直抵汀泗桥，威逼武昌。

在湘鄂联军紧紧追逼和湖北各界人士的声讨下，王占元深感势蹙时穷，乃于8月5日致电北京政府辞职，并发表《去鄂通电》，向鄂省人士宣告“自愿”解甲归农，以息湘鄂战争^⑨。11日，王占元乘楚材兵舰东下，途经上海抵天津，寓居英租界。这一年，王占元六十岁，从挑水夫爬到雄踞华中的两湖巡阅使，聚敛私财数千万元，息影津门后便过着富翁生活，但“他的怪刻之风依然不改，他在天津置了大批房产，腰挂大把锁匙，每月亲自收取房租，因而有人笑他在天津团居的那一段时期，干的差使是‘天津各大马路巡阅使’”^⑩。1930年王占元死于天津。

（下转第6页）

影响着现代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让理论“下凡”，走向实践，理论才能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才会有发挥作用的广阔领域。仅仅把思想政治工作局限在政治学习时间和会场上、课堂上，思想政治工作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脱离实际的倾向。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要敢于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正确地抵制和反对精神污染。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是复杂的，加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学派的传入，更加使这个领域错综复杂。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对广大群众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既不能简单禁绝，也不能消极回避，只能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进行剖析和分辨，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抵制和反对其有害的因素。真理只有同谬误斗争才能显示真理的力量，革命理论只有同错误思潮较量才能保持其纯洁性，人们也只有通过比较、鉴别、选择才能增强识别真伪，抵制污染的能力。不让接触错误的东西，就不会识别错误的东西，不会识别错误的东西，也就不能抵制错误的东西。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勇敢地带领群众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清醒头脑，认准方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夺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胜利做出贡献。

注释：

①⑤ 胡耀邦：《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5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84页。

（上接第56页）

驱王运动的胜利，动摇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湖北人民争民主、反军阀的斗志，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注释：

①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申报》1920年2月、10月、1921年1月15日、3月2日、7日、11日、31日，4月1日、24日、25日、28日，6月7日。

②⑦⑧⑨⑩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新湖北》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

③⑥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汉口新闻报》1917年11月19日，1919年5月16日，1921年1月30日，4月4日，26日、5月16日，10月18日。

④⑤⑥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第三册。

⑩ 参见《五四运动在武汉资料选辑》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⑪⑬ 《大汉报》1919年12月7日、20日。

⑭ 《时报》1919年5月22日。

⑰⑱⑲ 《民国日报》1920年3月26日，11月20日，1921年4月4日。

㉑㉒㉓㉔ 《新中洲报》1921年8月6日，10月25日。

㉕ 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0页。

㉖ 《民国人物传》第二辑。

㉗㉘ 《晨报》1921年6月12—27日。

㉙㉚ 《施伯高传》载《党料资料》1955年第一册。

㉛ 章君毅著《吴佩孚传》。